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2024

贸易和发展报告

在不满的时代
重新思考发展

概　述

联合国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2024

贸易和发展报告

在不满的时代
重新思考发展

概　述

联合国

2024年，日内瓦

© 2024年，联合国

本出版物供开放获取，但须遵守为政府间组织订立的知识共享许可协议，可查阅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3.0/igo/ 。

本出版物所采用的名称及其图表中材料的编写方式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对于任何国家、领土、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于其边界或界线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

提及任何公司或特许工艺之处并不意味着联合国表示认可。

文中资料可影印和转载，但须注明出处。

本出版物经外部编辑。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印发的联合国出版物

UNCTAD/TDR/2024 (概述)

目录

前言　第iv页

全球化已步入拐点　第vii页

第1页
全球经济低增长的新常态

第9页
贸易结构和贸易政策的变化

第17页
服务经济的曙光？

第23页
大宗商品新周期中的金融化

第31页
全球南方及其对长期发展资金的寻求

©2024_UNCTAD

前　言

如果只看全球平均水平，2024年世界经济实现了专家所说的“软着陆”，通货膨胀得到抑制，同时没有陷入衰退。这是重要成就。但是《2024年贸易和发展报告：在不满的时代重新思考发展》表明，现实情况更为微妙。虽然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增长前景看好，但全球南方的总体情况是增长乏力，日益面临全球冲击，并且存在贸易碎片化的风险。

据本报告预测，2024年和2025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2.7%，连续三年低于疫情前3%的增长趋势。区域层面，南亚的增长最具活力。全球三大经济力量—中国、美利坚合众国和欧洲联盟—增长正在减速或减弱。虽然技术革命如火如荼，但是全球南方的许多国家深陷债务泥潭，面临资金和资源外流、投资萎靡和强制紧缩等多重困境，要实现亟需的经济活动加速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依然可望而不可及。在46个最不发达国家中，目前只有一个国家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下维持7%的年增长率这一目标。

从许多方面看，目前全世界的情况是，超过15年前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缓慢增长的“新常态”正在进一步恶化。但地缘政治和经济思维方面的重要转变—包括产业政策回归、贸易的多极格局和新技术创新—表明，全球化本身正步入拐点。由此是否将带来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球范式尚未可知。

本报告试图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第1章和第2章分析了全球经济、国际贸易、金融市场、大宗商品和资本流动方面的主要经济趋势。第3章和第4章探讨了当前全球化的转向，其特点是全球贸易结构的变化、技术创新以及南南贸易兴起。第5章围绕更加公平的国际税收制度和能够为发展中国家适应这个新时代并繁荣发展提供所需政策空间的全球金融架构提出了具体构想。

《2024年贸易和发展报告》呼吁采取行动，报告显示，尽管我们面临许多挑战，但发展中国家显然有机会实现持续的人均增长，特别是在可再生能源和关键矿产、南南贸易以及战略性地利用新一代产业政策方面。报告呼吁决策者、学术界和民间社会参与重要对话以找到解决办法，从而减少当前现状的脆弱性和波动性。最重要的是，报告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我们并非只能坐等未来发生，未来由我们共同铸造。全球化正在转变，我们必须谨慎并且有计划地将之引向可持续发展。

贸发会议秘书长
蕾韦卡·格林斯潘

©Shutterstock_ Santos Akhilele_ Crime

全球化已步入拐点

当今时代，地缘政治脆弱，世界经济被各种危机和气候变化削弱，同时面临着不断加速且影响深远的技术变革。这些力量对发展有何影响？全球南方经济体如何能够最好地应对这些挑战？

技术、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转变相互交汇，将全球化推向一个关键时刻，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挑战。

《2024年贸易和发展报告》指出，目前的几大转变正推动全球化步入拐点，从而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多重挑战。与绿色转型相关的新技术、人工智能、生物信息学和金融创新预示着下一次全球增长浪潮的到来。这可能使合成材料的使用更广泛，装配流水线更廉价，并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劳动分工和市场竞争。与此同时，地缘政治紧张影响着贸易和投资决定，可能导致产业回流加快。

拐点并非新鲜事物。六十年前贸发会议成立之时就是一个类似的剧变时代。之后几十年中，非殖民化达到顶峰，实行固定汇率和资本管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土崩瓦解，打造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初现端倪后无果而终，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悄然兴起。其中每一个因素都决定性地影响了南方经济体在贸易驱动的全球化演变中可以选择的发展轨迹。

全球金融、贸易和债务压力正导致世界出现裂痕，这突出表明需要新的发展路径。

当前的转向凸显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诸多陈年痼疾。全球金融、贸易和债务方面的压力正在固化世界经济中的裂痕，同时突出表明亟须找到能够实现公平和可持续增长、推进绿色转型并建立顺应发展需求的国际金融架构的发展路径。

机遇也在涌现，例如全球南方可借机重新表达其需求和优先事项。本报告考察了五个核心主题：

- **A** 全球经济低增长的新常态
- **B** 贸易结构和贸易政策的变化
- **C** 服务经济的曙光？
- **D** 大宗商品新周期中的金融化
- **E** 全球南方及其对长期发展资金的寻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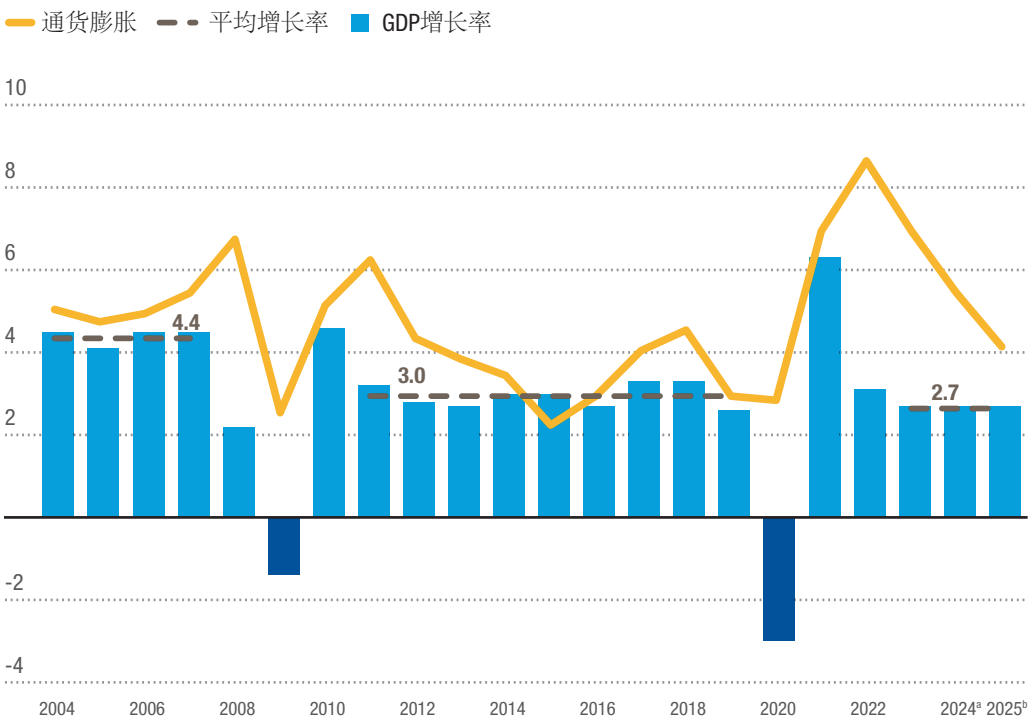
©Shutterstock, ChameleonsEye

1

全球经济低增长的新常态

2024年，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通货膨胀依然存在但继续稳步下降，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都是如此(图1)。2024年8月的金融市场动荡引起了关切，但并未导致更广泛的金融风险传染，尽管不确定性持续存在。印度、卢旺达和越南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加速扩张。而孟加拉国、科特迪瓦和印度尼西亚等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增长强劲。国际贸易和净资本流动已从疫情后的低点反弹。大宗商品价格在几年的高度波动之后已从2022年的高点部分回落，不过与历史标准相比仍处于高位。

图1
通胀压力缓解，全球产出增长平平
世界产出增长与通货膨胀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联合国全球政策模型。
注：GDP指国内生产总值。产出增长基于2015　年不变价格GDP(市场汇率)计算得出。灰色虚线表示2004-2007年、2011-2019年和2023-2025年的年均增长率。通货膨胀率通过国家和区域国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的加权平均值计算得出。
[a] 估计值。
[b] 预测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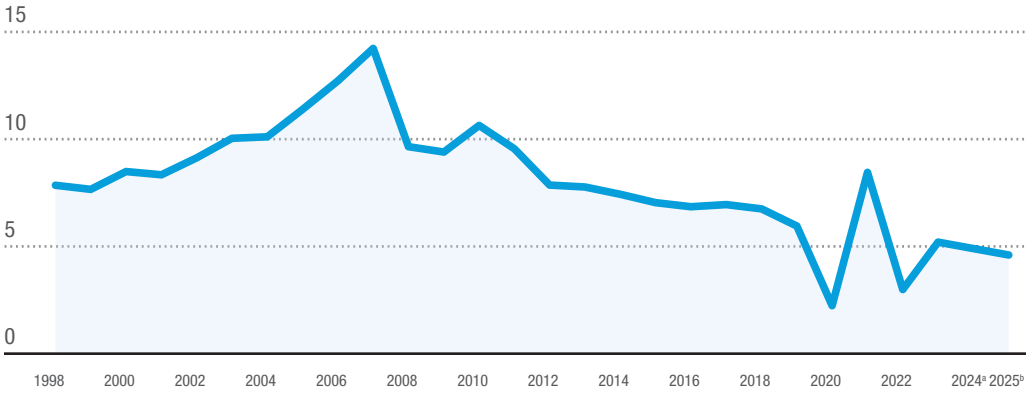
然而表象之下透出一些重大挑战。预计2024和2025年全球增长都将处于2.7%的低位，表明经济停滞不前。关键在于，预测显示出中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经济减速以及欧洲联盟的弱增长(图2)。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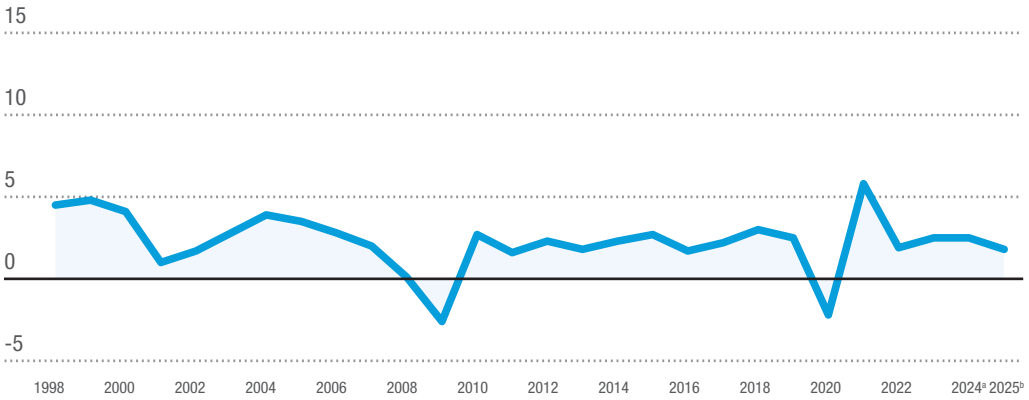
停滞和减速困扰着世界主要经济体

部分经济体实际GDP增长率
(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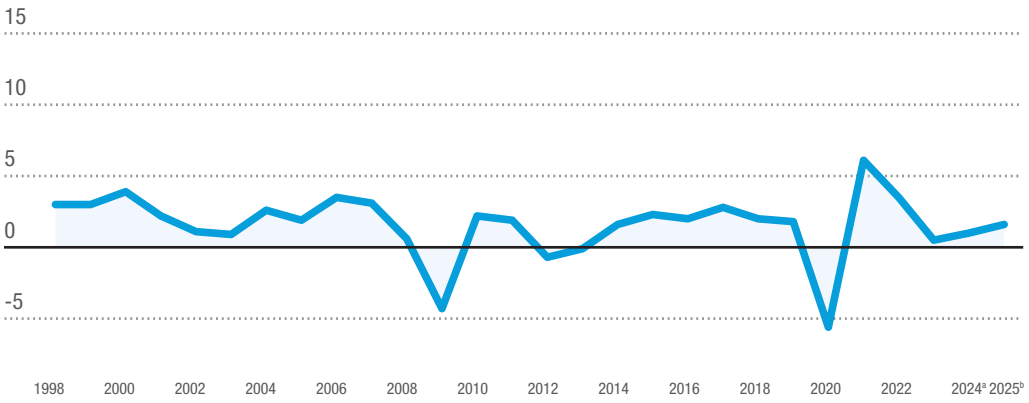
A. 中国



B. 美国



C. 欧洲联盟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联合国全球政策模型。
注：根据2015年不变价格GDP。
[a] 估计值。
[b] 预测值。

全球增长“新常态”不足以让发展中国家应对其面临的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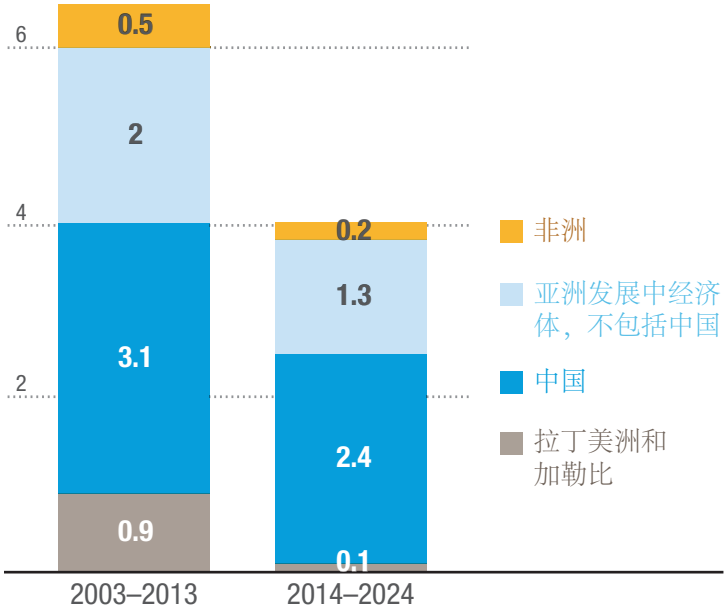
低迷的全球形势表明，多年的危机和高利率侵蚀了增长潜力。全球南方损失尤其惨重。发展中经济体2003-2013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6.6%，但2014-2024年平均增长率仅为4.1%。过去十年中，除中国外，全球南方经济体平均每年增长2.8%。

这一趋势意味着，“新常态”正在趋稳，其速度不足以让发展中国家应对其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挑战(图3)。

图 3

危机削弱了整个全球南方的增长潜力

部分经济体和集团对全球南方经济增长的贡献
(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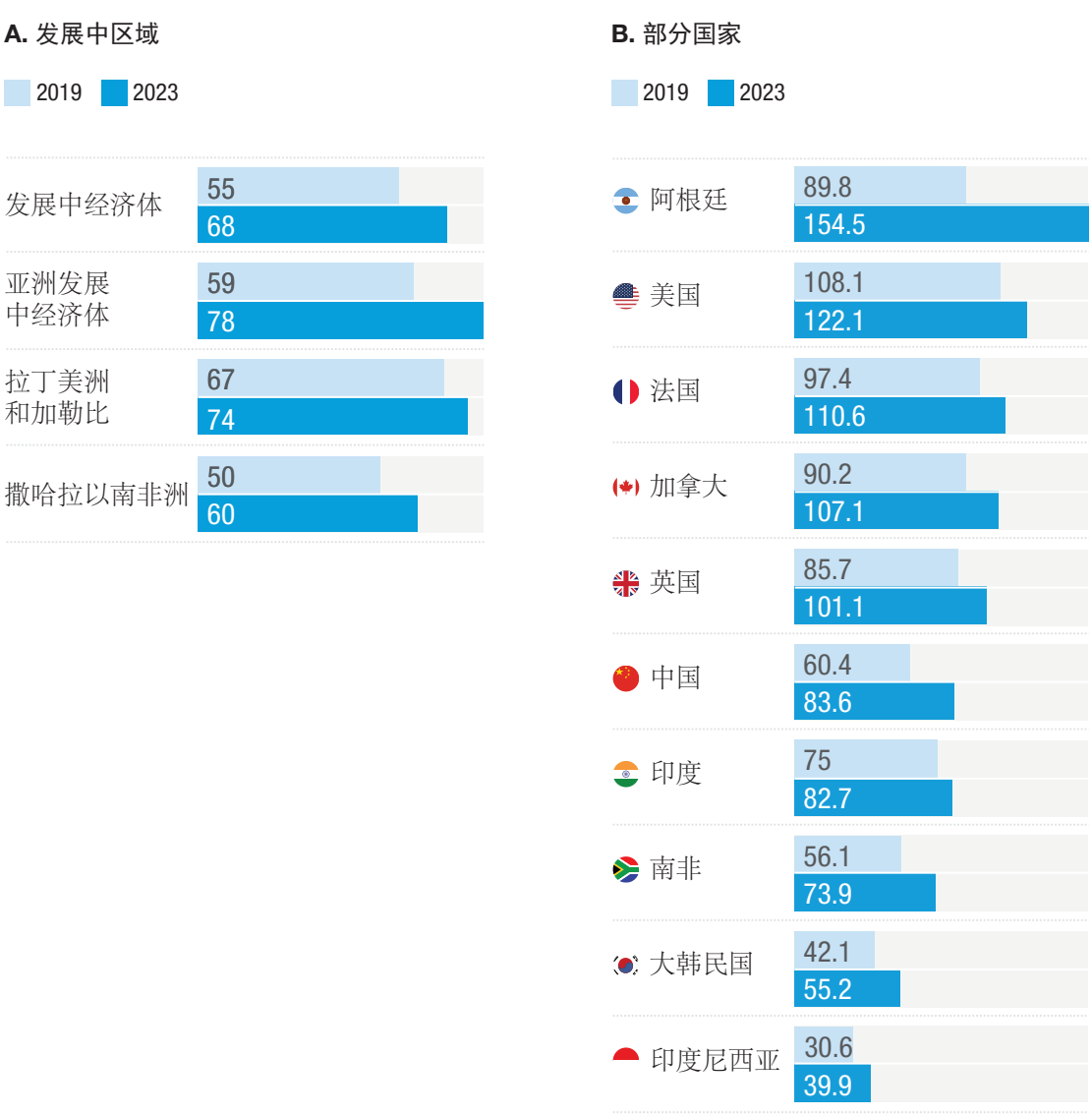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联合国全球政策模型。
注：数据反映出所分析的两个时期内的年均增长率。全球南方是指贸发会议发展中经济体组别。

从全球南方债务形势来看，当前的全球状况尤其令人担忧。发达经济体实行高利率，而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二者的叠加降低了政策灵活性，提高了偿还外币债务的成本。财政压力和金融稳定风险也因此上升(图4)。

图 4

COVID-19冲击之后公共债务水平大幅增加

一般政府，债务总额
(占GDP百分比)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4)。《世界经济展望》。4月。
注：COVID-19，指2019冠状病毒病。“一般政府”指中央、州和地方政府以及由这些机构控制的社会保障基金。2023年估计值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许多经济体公共债务率高企—这是疫情后新常态的典型表现—增加了回归紧缩政策方针的风险。发展中经济体的公共债务水平在四年中攀升了15个百分点。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将越来越多的出口收入用于偿还债务，这突出表明迫切需要改革国际债务结构。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许多经济体公共债务率高企，增加了回归紧缩政策方针的风险。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消费者的不满

疫情后通胀飙升，主要由全球供应链瓶颈和特定行业垄断所导致的供给端问题所驱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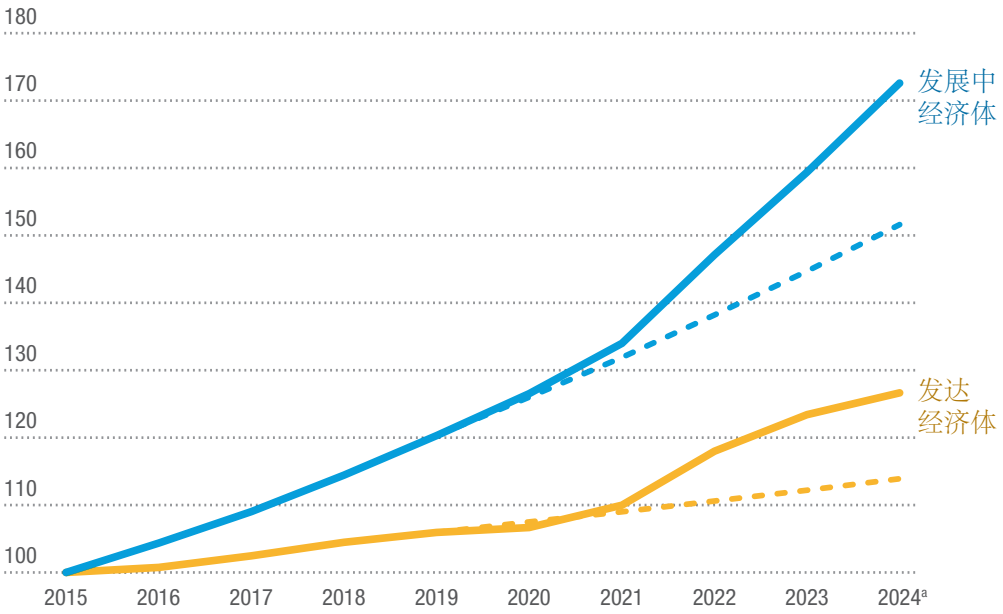
疫情后的通胀飙升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供给问题，源于全球价值链瓶颈和某些行业(特别是农业和能源大宗商品)内存在的过度寡头垄断。随后各国、特别是发达经济体过度依赖货币紧缩，将其作为把通胀降至目标水平的主要政策工具，在国内和国际上造成了不必要的过度困难。

于是，疫情后的复苏中存在普遍的不满情绪。居民消费价格和信贷成本升高侵蚀了家庭可支配收入，导致许多国家的消费支出低于疫情前水平(图5)。高收益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以及对未来此类工作岗位将不复存在的认知(图6)营造出一种普遍的经济朝不保夕之感。这增加了许多发达经济体国内的脆弱性，并加剧了国际经济碎片化的风险。

图 5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家庭购买力都受到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侵蚀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2015年=100)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24)。《世界经济展望》。4月。
注：虚线对应的是基于疫情前(2015-2019年)趋势的估计值。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总量使用几何平均数计算得出。
[a] 估计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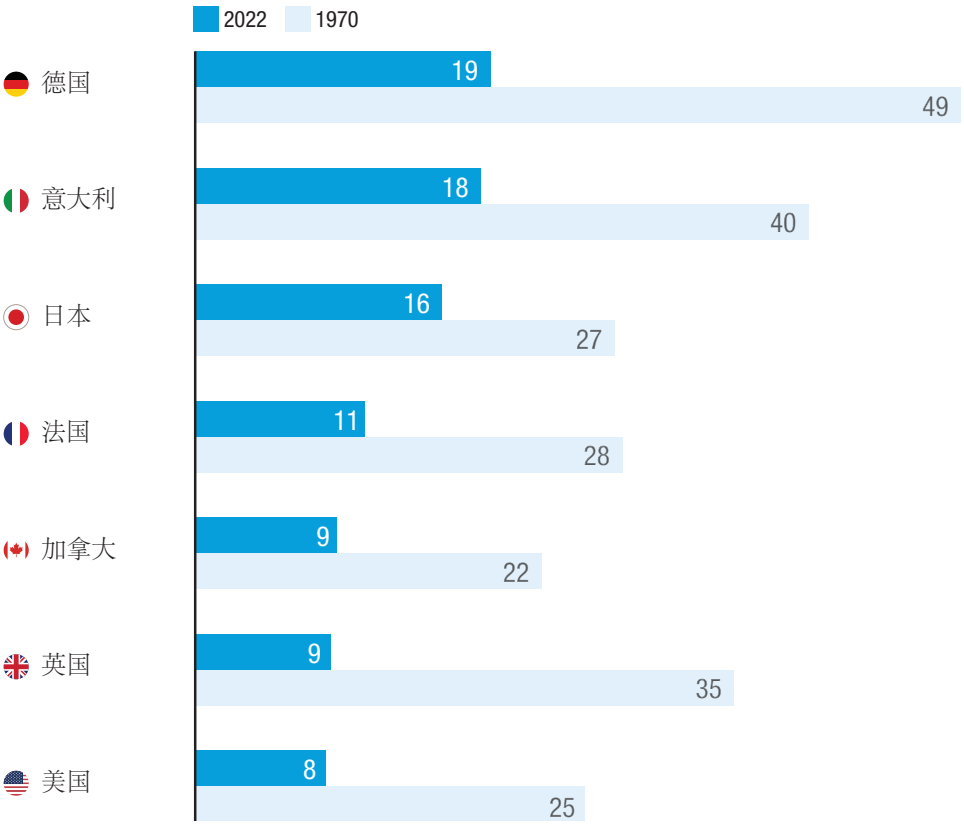
新的产业和贸易政策是为应对公众对全球化后果的不满提供了政治手段。

过去十年中，国际贸易的特征是贸易紧张加剧，保护主义抬头，产业逐步回流，供应链日益被视为国家安全问题。这些措施部分源于主要经济大国之间的竞争和摩擦。但新的产业和贸易政策也为应对公众对全球化后果的不满提供了政治手段。

图 6

发达国家的工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经可以指望拥有稳定就业岗位，但如今许多人已难以在该领域找到此类工作

部分发达国家制造业在总就业中占比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产业政策正重回发达经济体的议程，但是在发展中经济体以产业政策作为政策工具仍然不被认可，原因是据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不具备适当体制框架，则风险大于收益。然而，成功的发展案例表明，产业政策不可避免会带来风险，但也会使治理结构和监管框架得到改善。

当今背景下，新的产业政策需要能够适应外部制约因素，并需要加以扩展，涵盖所有经济部门，包括服务业。在国际上，这需要加强政策协调，包括在气候方面。由此将产生一系列积极成果，其中之一是气候风险的缓解，这可以减少极端天气情况所致通胀压力，并降低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然而，地缘政治已将环境关切和进步经济政策挤出了许多政府的优先事项。在这一背景下，多边机构是改善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政策协调的关键。

现代产业政策必须解决影响增长和贸易的环境、人口、金融和技术因素。

总体上，从2024年的全球经济表现来看，
制定政策需要围绕以下三大优先事项：

- **扭转发展中经济体收入不平等加剧、实际工资停滞不前和经济增长并未带动就业的趋势。**为此需要有效的结构多样化政策、增强国家能力与引导、对社会保护的切实承诺以及包容性的增长战略。

- **主要发达经济体所采取的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立场，可能激化国内外的不满情绪。**当前债务处于危险水平，贸发会议提出了变革性的建议，以帮助在发展中国家降低融资成本，减轻主权债务脆弱性。

- **展望未来，采用渐进式的通胀应对策略，并运用更广泛的政策工具来稳定物价，将为需求拉动投资提供更多的时间。**由此带动的商品部门产能扩张，也将在中期缓解通胀压力。

通向新发展战略之路

当前的增长态势与技术变革加速同时出现，表明有可能过渡至新的全球增长浪潮。从长期看，这可能会影响许多经济体的发展道路。应对这些变化的战略应考虑以下三组因素。

当前的增长态势与技术变革加速同时出现，表明有可能过渡至新的全球增长浪潮。

首先，新的增长浪潮几乎总会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需求，这是积极的一面。转向电动车使得对关键矿物和稀缺材料的需求增加，从中已可见一斑。

其次，在发达经济体，历史上新兴产业生产率的提升推动了工资上涨，并促使低生产率部门因寻求更低的劳动力成本而外迁。然而展望未来，廉价劳动力不太可能成为外国决定是否投资的主要标准。新技术可能会扰乱现有市场，影响贸易流动和经济稳定。对关键矿物和稀缺材料的依赖加剧了这种风险。

第三，需求波动、供应链问题和地缘政治可能在新能源技术和运输模式领域导致价格大幅波动。随着技术的演进，全球权力动态和贸易平衡将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贸易关系。

单靠市场机制无法实现所需的结构性变革，因此产业政策的介入不可或缺。

国际协定和机制对于应对能源转型的复杂挑战将具有重要作用。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多元化以及《巴黎协定》所确立的气候目标，就必须加快化石燃料的淘汰进程；然而，化石燃料的高盈利性及持续存在的补贴政策，严重阻碍了绿色转型的推进。

对现代产业政策采取战略性方针是实现有气候意识的发展范式的关键所在。鉴于当前全球贸易、投资和技术的动态，这种方针应超越工业化本身，需综合考虑环境、人口、金融与技术等因素之间日益紧密的相互作用，这些因素共同影响着经济增长、贸易格局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重塑。

2

贸易结构和贸易政策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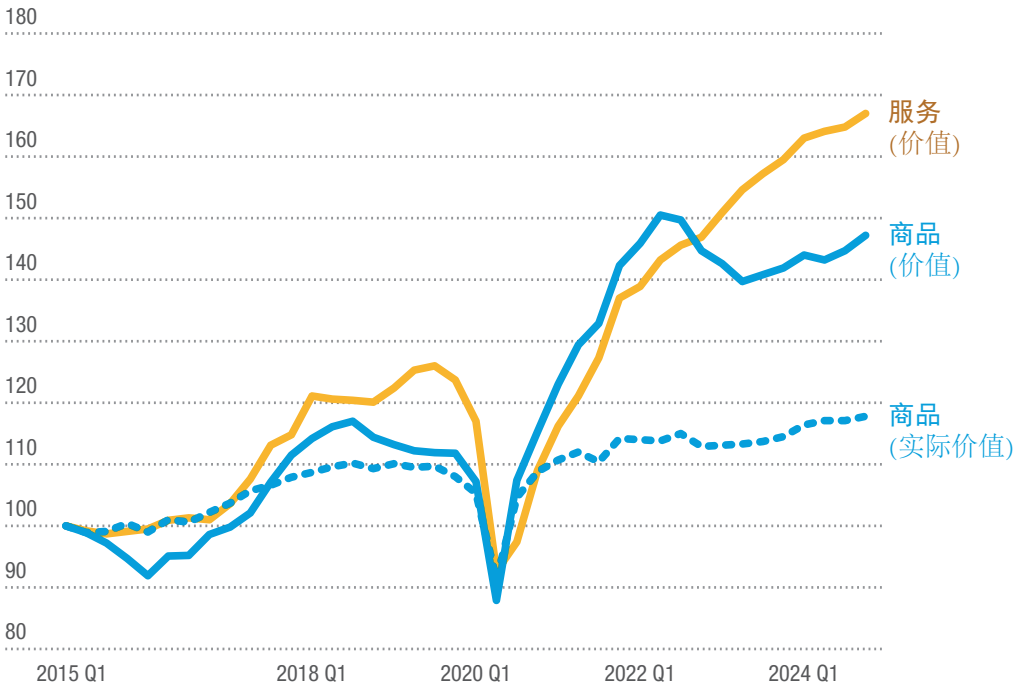
由于国内优先事项、气候承诺和产业政策演进，全球贸易正在发生巨变。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2023年处于停滞状态，预计2024年最终将实际反弹约2%。

这一反弹主要由商品贸易的复苏带动，商品贸易占贸易总量的75%。然而相较于商品贸易，服务贸易依然展现出更强的活力，并持续保持5%的稳健增长(图7)。2024年第一季度，交通和旅行板块增长率为两位数，其他商业服务增长率约为5%。

图 7

服务贸易仍然比商品贸易更有活力

季度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2015年第一季度—2024年第四季度
(2015年第一季度=100)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贸发会议数据库。
注：Q1指第一季度。所有序列均已经过季节性调整。2024年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的估算数据来自贸发会的即时预测。

然而总体上，2024年底全球贸易将放缓。对贸易的限制和内向型产业战略，特别是主要经济体的这些做法，预计将影响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贸易。结构因素也在贸易减速中起了作用，需在更宏观的背景下加以理解。

全球贸易放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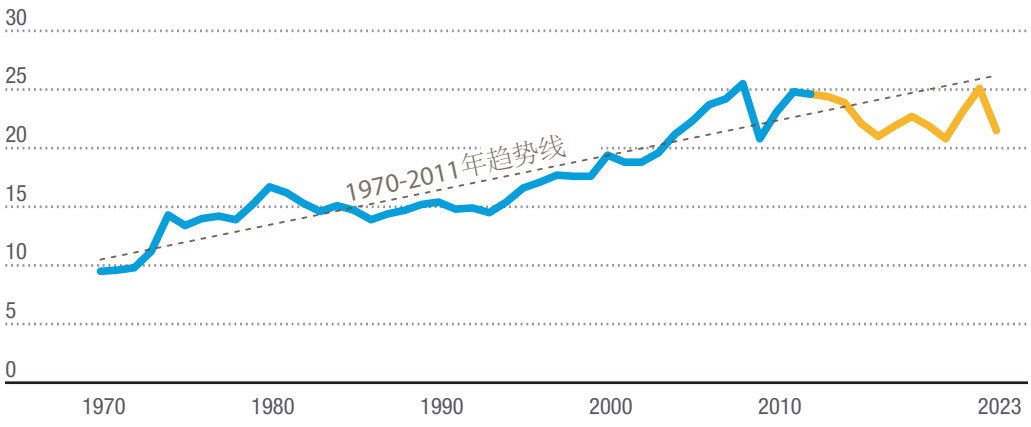
总体上，虽然全球贸易的绝对值持续增长，但自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其相对于全球GDP的增长已陷入停滞。从1995年到2007年，贸易的增长速度是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两倍，但全球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于2008年达到25%的峰值后一直停滞不前或有所下降。这种放缓既反映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也反映了更广泛的经济碎片化。

变化的全球动态加上贸易乱局加剧了中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困难。

全球动态的变化加上2020年和2021年的贸易乱局加剧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困难，其中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贸易。许多初级商品出口国面临“再初级化”的影响。在向非采掘产业转型的过程中陷入停滞的很多经济体，制造业中的就业机会减少，非正规就业增加，限制了结构转型的范围(图9和10)。

还有其他因素的作用，2023年国际贸易的转向便是例证。世界贸易相对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逐渐趋稳(图8)，但2023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动向，即商品贸易收缩，全球经济活动则出现扩张。贸易收缩的情况虽然罕见，但并非闻所未闻。四十多年来，全球贸易仅在2009年和2020年出现过两次收缩。然而这两次贸易收缩时，世界生产总值也呈收缩状态。

图 8
第五次增长浪潮中，出口快速增长但世界贸易趋稳
世界贸易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贸发会议数据库。

结构多样化的发展战略应针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包括非贸易制造业和服务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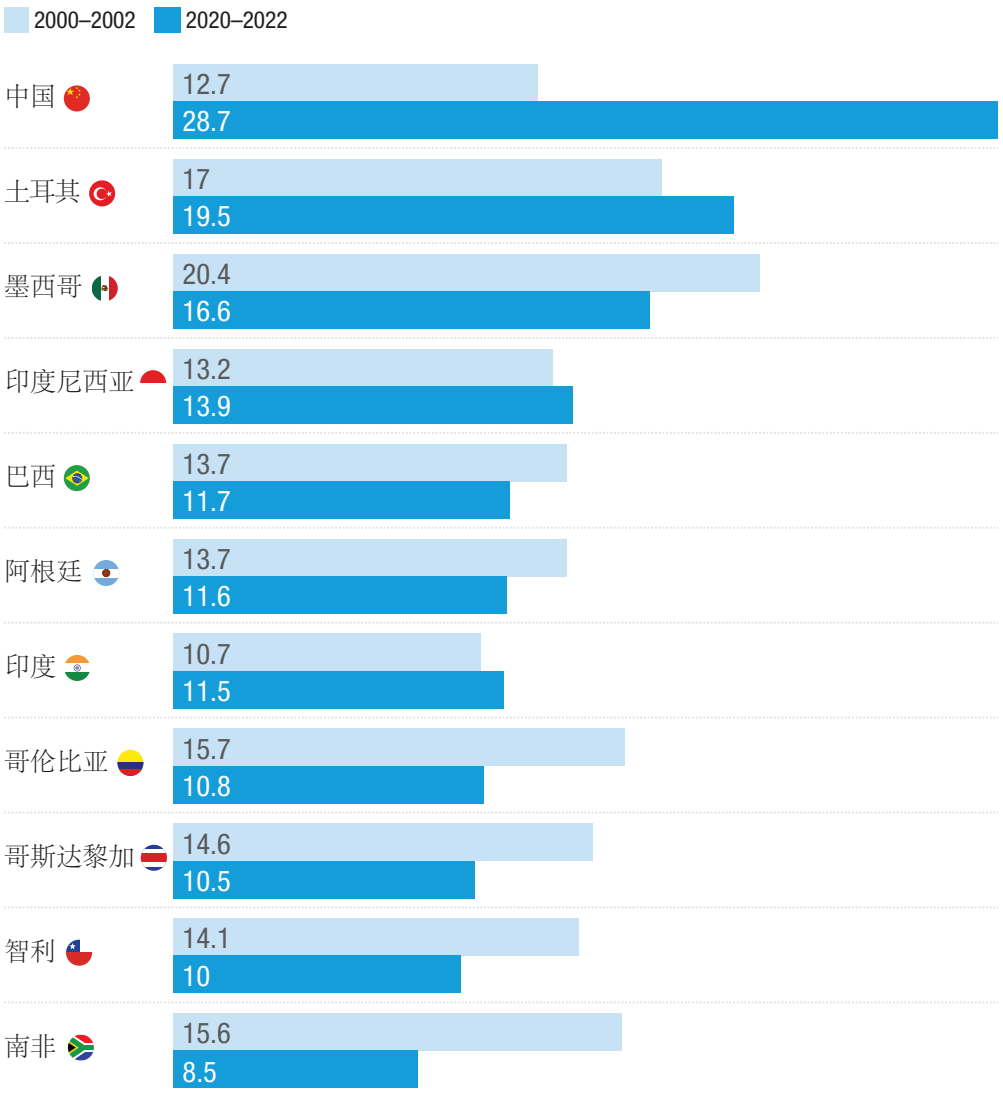
相反，2023年全球商品贸易出现结构性放缓，服务贸易则实际增长5%，说明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性不断上升。2023年，服务业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达到近25%，预计将进一步增长，因此有预期认为，国际服务业可能成为新的增长引擎。

然而这种希望为时过早，因为单凭服务贸易，不太可能为撬动发展提供新的主要杠杆。与此同时，人们日益认识到，为了在劳动力吸收部门加强生产力和创造优质工作岗位，需要有一套结构多样化战略。这种战略应针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包括不参与国际贸易的制造业和服务业。

图 9

过去二十年中，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就业人数经常呈下降趋势

部分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就业人数在就业总人数中所占份额
(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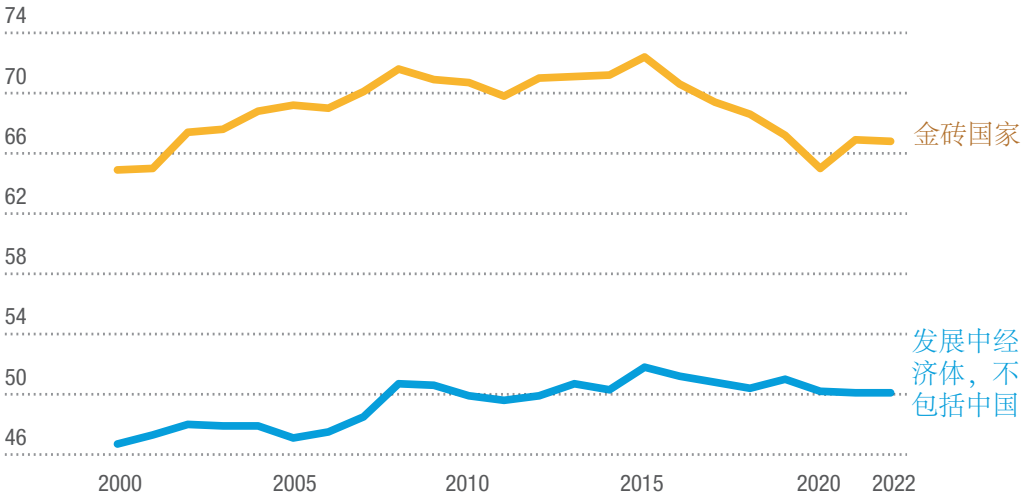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联合国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数据库。

图 10

结构性转型的缺失促使非正规经济活动上升，削弱了生产能力

生产能力指数，部分国家组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数据库。

注：金砖国家指巴西、俄罗斯联邦、印度、中国、南非。部分国家的结构变化。结构变化指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资源从低生产力经济活动向高生产力经济活动转移。这种转变目前体现在出口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固定资本的密集度以及工业和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数值越高说明某一经济体的复杂性和发展程度越高。

展望未来，世界贸易不太可能出现有力复苏

世界商品贸易长期放缓，加上技术进步，促使人们重新评估传统发展路径。对一些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制造业带动出口增长以创造就业、提高生产力和推动经济转型的模式似乎越来越有局限性。

不断变化的格局突出表明，制定发展战略时需要拓宽思路。决策者应重新考虑关键组成部分，以适应全球贸易的重新配置和新技术的影响。全球贸易拐点也提高了地缘政治风险，因为各国面临更不确定和更具竞争性的国际环境。

制造业带动出口增长的模式对一些发展中经济体而言似乎越来越有局限性。

政策焦点

- **为应对碎片化的贸易体系带来的挑战，**需要在国家和国际两个层面协调政策应对措施。

- **发展中国家将需要开辟政策空间，以加强国内产业并降低其对全球经济冲击的脆弱性。**促进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制造和投资，有助于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并实现财政可持续性。这类政策必须有国际协定加以支持，以防止贸易冲突并为进入全球市场和融资提供保障。

- **全球贸易动态或可为发展中国家谈判有利的贸易和融资安排提供契机。**2007年到2023年，南南贸易(发展中国家间贸易)翻了不止一番(图11)。这一态势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会，可借以减少对传统贸易伙伴的依赖和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

全球贸易动态为发展中国家谈判有利的贸易和融资安排提供了契机。

然而，区域主义的强化及国家利益优先导向的发展趋势也给发展中经济体带来了风险，特别是对于出口依赖全球市场的国家而言。发达经济体保护主义政策抬头，加上可能出现的贸易冲突和供应链中断，可能会阻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经济多样化和保持财政可持续性的努力。

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将需要发挥关键作用，以管理贸易碎片化的风险，并确保发展中国家在塑造全球贸易体系的未来方面有发言权。为减轻负面效应，努力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的产业补贴和贸易壁垒规则并采取举措支持南南贸易将至关重要。利用区域贸易伙伴关系和实施战略性产业政策可以帮助发展中经济体驾驭风险并建立更具韧性的多样化的经济。

保护主义抬头，外加贸易日益被视为国家安全问题，给出口依赖全球市场的发展中经济体带来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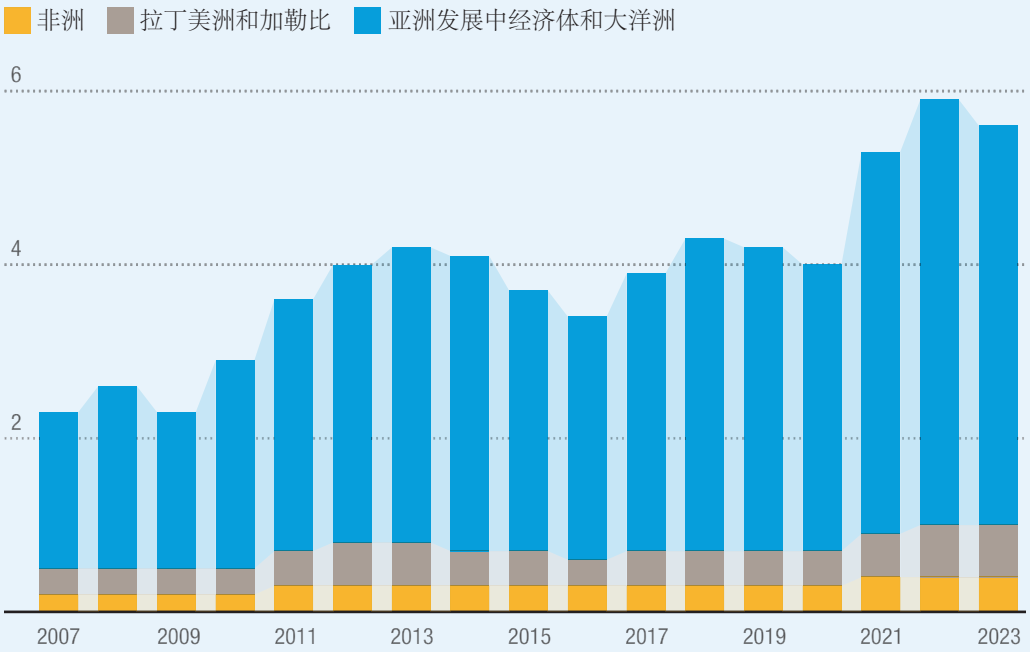
图 11

2007年到2023年南南贸易增长超过一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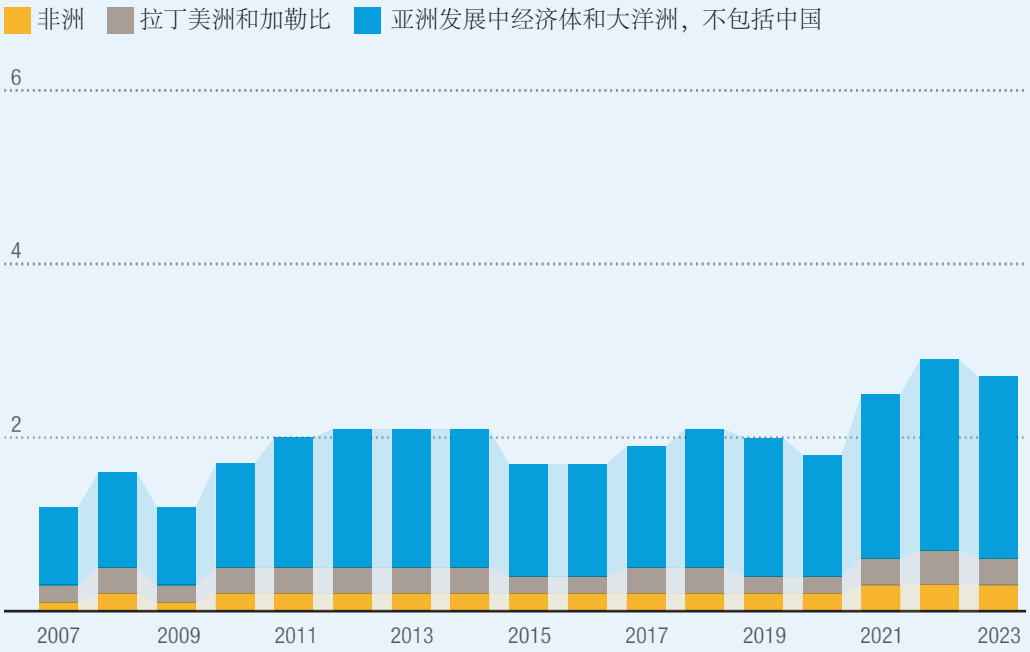
全球南方各区域的商品贸易

(万亿美元)

A. 南南贸易



B. 南南贸易，不包括中国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数据库。

注：所显示的商品贸易是该区域进出口的平均值。

©Shutterstock_ gyn9037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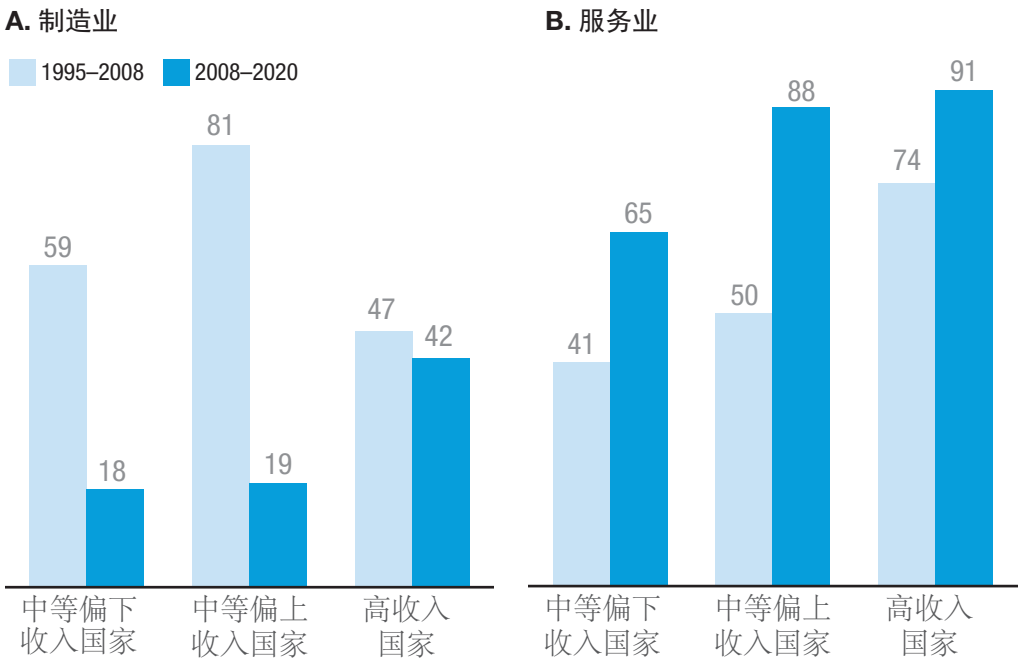
服务经济的曙光？

制造业仍然是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但其作为发展中国家增长战略的效力正在减弱(图12)。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代制造业依赖技能和资本密集型生产，廉价的低技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不再符合现代制造业的需求。此外，工业化的生态足迹及其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也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图 12

制造业带动的出口增长放缓，而服务业带动的出口则正蓬勃增长

经历制造业和/或服务业带动的出口增长的国家所占比例，部分收入组别
(百分比)



资料来源： Baldwin RE (2024). Is export-led development even possible anymore? Factful Friday blog. 7 June。可查阅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xport-led-development-even-possible-anymore-richard-baldwin-nusge/

注：这一数字反映了所考察的两个时期内每一收入组别中经历了出口带动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增长的国家所占百分比。如果某一国家这两个部门中有一个部门的出口增加值以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速度增长，则认为该国在这两个部门之一经历了出口带动的增长。一个国家可以同时出现这两类出口带动的增长。服务业带动的出口增长只考察信息和通信技术带动的服务贸易，不包括运输和旅游业。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组包括17个经济体，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组包括16个经济体，高收入国家组包括43个经济体。

2023年，发展中国家在服务出口收入中所占比例不到30%，在商品出口收入中所占比例为44%。

找到一条新路径并不容易；服务型经济的兴起和无形资产在投资中日益重要的地位和可能会放大南北不对称。在总值上，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服务出口收入中所占比例不到30%，在商品出口中所占比例为44%。投资项目转向服务业可能会强化全球南方经济一体化的结构性障碍(图13)。

图 13

转向服务业的投资流向变化可能会加剧结构性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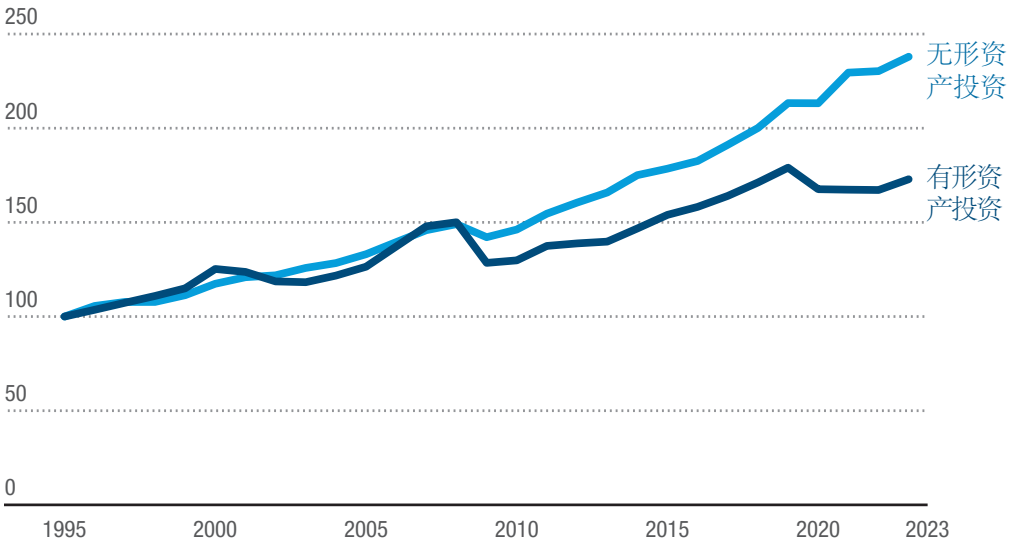
各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结构
(跨境绿地项目总数所占百分比)

	2004–2007	2008–2011	2012–2015	2016–2019	2020–2023
制造业					
非洲	3	5	5	6	5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8	11	14	13	13
亚洲发展中经济体	37	40	34	31	27
世界其他地区	51	44	47	50	55
其他有形部门					
非洲	9	10	12	8	8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12	12	15	16	11
亚洲发展中经济体	26	27	33	27	14
世界其他地区	52	51	40	50	67
服务业					
非洲	3	5	5	4	4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5	7	7	7	7
亚洲发展中经济体	36	34	31	26	27
世界其他地区	57	55	57	63	63
总计					
非洲	3	5	5	5	4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6	8	9	9	8
亚洲发展中经济体	36	34	31	27	26
世界其他地区	55	52	54	60	62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金融时报旗下FDI Markets数据库的信息。
注：部门分析的依据是“业务活动”这一变量。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服务”包括典型制造业内的服务活动(例如汽车制造商的销售处)。“制造业”如数据库里的分类。“其他非服务业”包括通常归类为服务业但实质上有形资产比重大的若干活动；具体包括以下类别：建筑、电力、采掘和基础设施。　“服务业”包括所有其余(与服务相关的)业务活动。“信息通信技术和互联网基础设施”这项业务活动细分为互联网基础设施(归入“其他非服务业”)和其余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归入“服务业”)。

传统贸易统计数据忽略了通过全球价值链出口的无形服务。这导致发达经济体的出口被低估，并扭曲了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差额数据。品牌、设计、专利技术和供应链知识等无形资产日益成为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取得成功的推动因素，由此可能出现“无工厂”生产，即公司没有制造活动，但控制设计和营销。过去15年中，对软件和数据等无形资产的投资激增，增长速度是实物资产投资的三倍，到2023年已达到6.9万亿美元，有形投资增至4.7万亿美元(图14)。

图 14
公司主导全球价值链并从中受益的能力越来越依靠无形资产
无形和有形投资总额
(1995年=100)



资料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路易斯商学院(2024)。《全球无形资产投资简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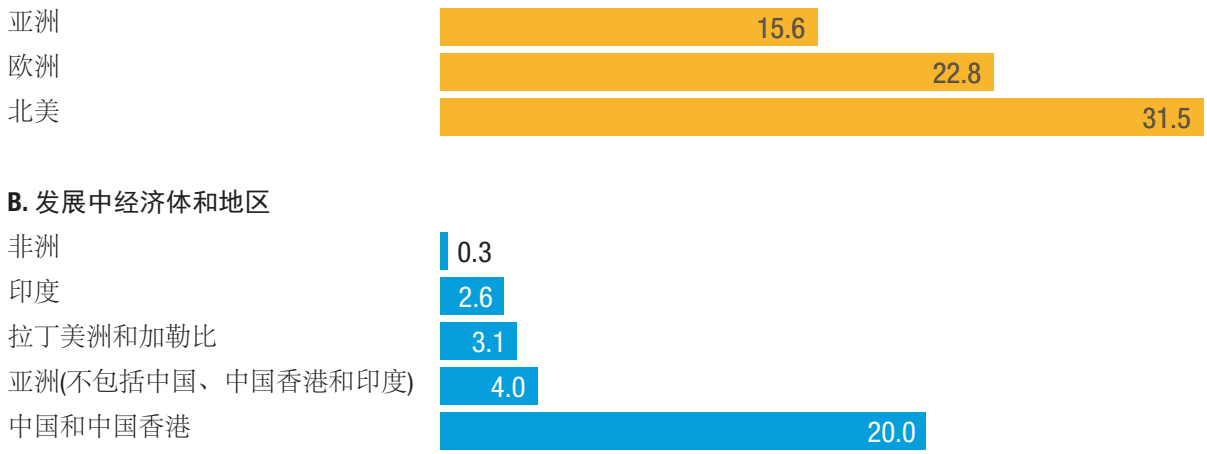
创意服务贸易的市场集中度突出表明了发达国家公司的主导地位。

创意服务贸易的市场集中度突出表明了发达国家公司的主导地位。2022年，创意服务的价值为1.4万亿美元，发达国家占出口的80%，尽管它们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例不到60%。这种集中还体现在提供国际服务的跨国企业的地理分布上。2022年，这些跨国企业的总部70%设在发达地区，收入总额近35万亿美元，是服务贸易额的5倍(图15)。

图 15

业务占据大部分服务贸易的主要跨国公司总部位于发达地区和中国

提供国际服务的大型跨国企业总部所在地的比例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Eikon。
注：样本来自924家公司，包括上市和非上市公司，每家公司2022年商品和服务销售收入都超过100亿美元，并且是从事国际服务贸易活动的公司(即不包括主要参与商品生产和出口的公司)。

政策焦点

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的眼光需要超越制造业带动的出口，让经济各部门都能实现生产率增长。

目前，服务贸易无法在发展中国家创造足够的优质就业机会。因此，政策需要向绿色转型以及促进能够吸收劳动力的服务业活动倾斜。在这方面，三管齐下的战略可侧重于：

- 鼓励大型企业在非贸易服务领域创造低技能就业机会。
- 为小型企业提供公共投入，并帮助它们获得能够提高生产力的投资机会。
- 投资于技术，使其补充而非取代服务部门的低技能工人。

总体上，当前时期低迷的商品贸易和快速数字化表明，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的眼光需要超越制造业带动的出口，让经济各部门都能实现生产率增长。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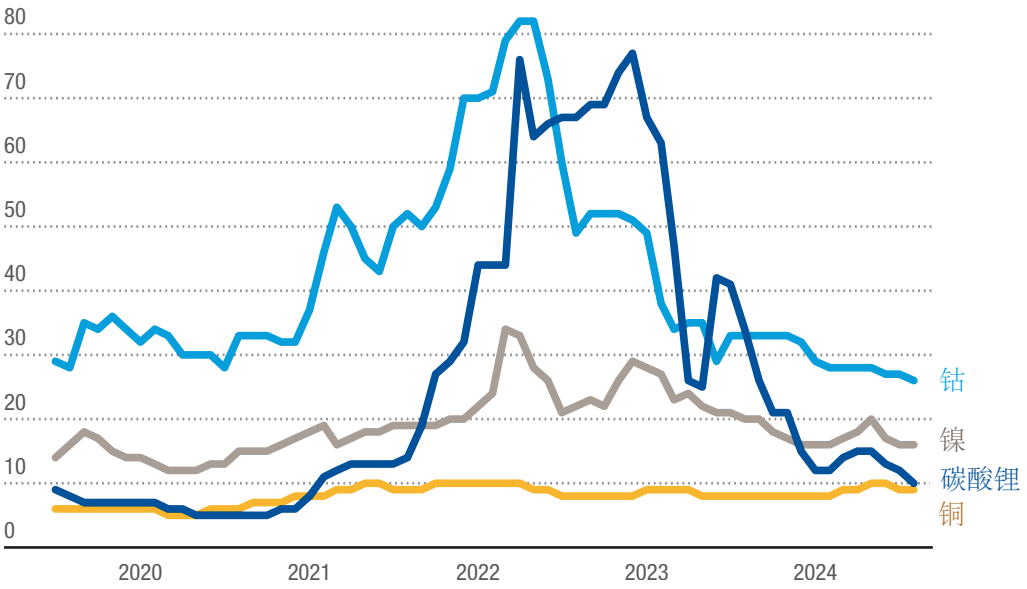
大宗商品新周期中的金融化

截至2024年7月，大宗商品价格较2019年上涨逾20%，尽管相比乌克兰战争后的暴涨已有所滑落。2024年初，非燃料大宗商品价格有所上涨，燃料价格则因全球需求减少而微跌。2023年能源转型关键矿物—锂、钴和镍—价格分别暴跌78%、34%和42%，原因是产量飙升和供过于求(图16)。

图 16

能源转型关键矿物的价格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供应瓶颈反应灵敏

部分能源转型关键矿物价格
(每吨千美元)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经济数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Eikon和世界银行大宗商品价格数据(粉单)。

中国在这些矿物的全球需求中占主导地位，对价格波动影响很大。为应对价格波动和地缘战略竞争，2023年，各国签署了22项贸易协议，以确保矿产供应。生产国实行了出口限制，可能会令矿产市场进一步收紧。

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全球矿产勘探预算继2021年飙升了34%之后，2022年再度增长了16%。拉丁美洲吸引了25%的勘探活动，非洲次之，吸引了17%的勘探活动。关键矿产投资2021年增长了20%，2022年又剧增30%。虽然增长显著，但尚不清楚这些投资能否满足不断增长的对关键矿物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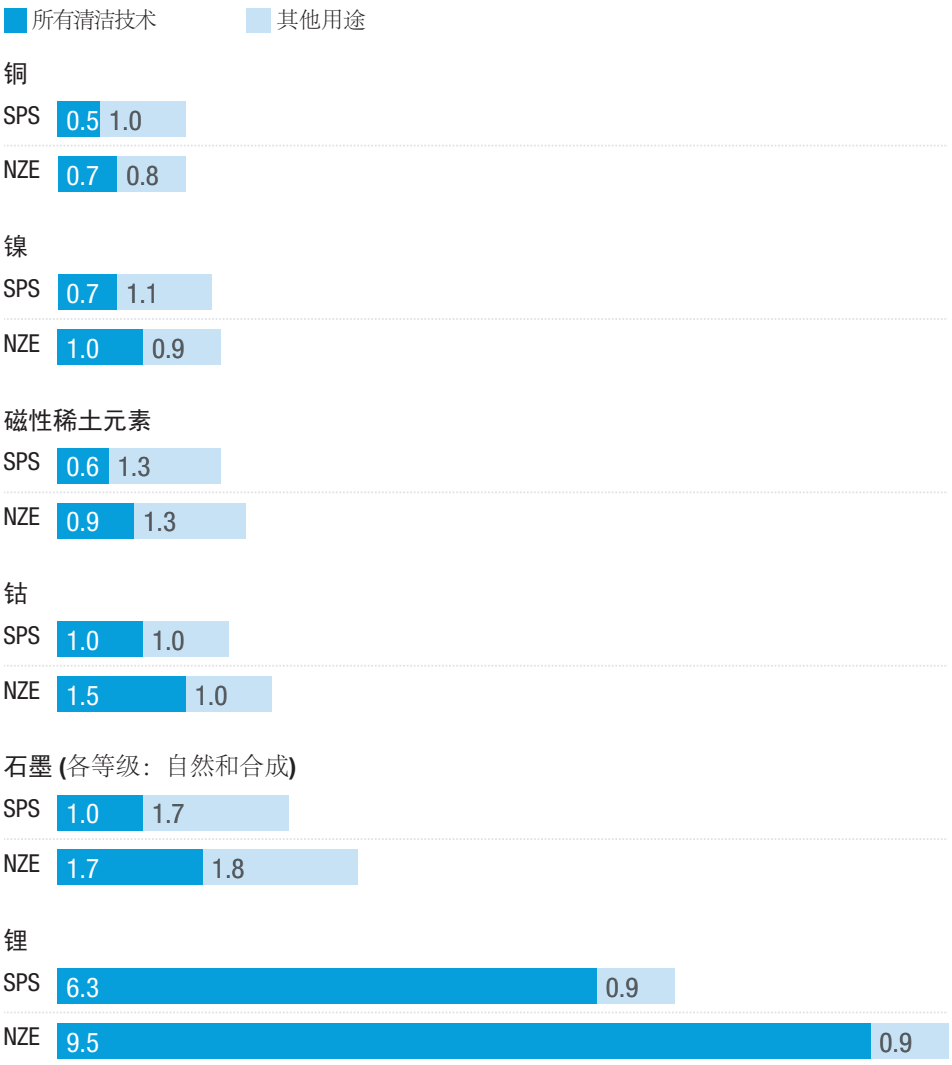
面对急剧增加的对转型矿物的猎取，全球的应对措施主要集中于扩大矿物开采(图17)，一些发展中经济体预期将因此受益。进口国希望确保获得电气化所需矿物，为此正在扩大国内采矿业务。

进口国希望确保获得转型矿物，通常做法是扩大国内采矿业务。

图 17

对能源转型关键矿物的需求迅猛增长，到2050年可能大幅攀升

到2050年既定政策情景之下和净零排放情景之下的需求相对2023年需求的比率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24). Global Critical Minerals Outlook. Paris。
注：SPS指既定政策情景；NZE指净零排放情景。

切勿夸大转型矿产需求对众多国家的发展的推动作用。

然而，不应夸大矿产需求对众多国家的发展的推动作用。可再生能源所需的一些材料(例如锂)地理分布广泛，尽管目前加工较为集中。另一些材料(例如钴和稀土)则并非如此。

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已开始采取新的产业政策引导本地生产。挪威当局2024年6月宣布发现一个880万吨储量的稀土元素矿床。出于安全关切，各国加大力度寻找更容易在当地获得的电池材料(例如铁)，而不是依赖供应来源集中的矿物(例如钴)。

新能源

出于安全关切，各国加大力度寻找更容易在当地获得的电池材料。

脱碳政策与市场力量交织共振，加快了电气化和清洁运输的发展。全世界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补贴太阳能和风能产业，使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电价与煤炭乃至天然气发电的电价相比已具有竞争优势。这一转变表明，煤炭使用量将出现下降，依赖煤炭出口的国家将因此受到影响。

此外，车队的电气化预计将大幅减少化石燃料需求，特别是石油需求。石油出口对许多发展中经济体至关重要，2010年至2022年，这些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原油出口的81%。石化产品和航空燃料需求或将保持稳定，但这些部门在全球石油需求中仅占20%。

与之相反，占全球消费量半数的陆上交通运输对石油的需求正在下降。2022年，全球石油产量低于2018年的峰值，主要石油公司将利润分配给股东而不是投资于新的生产，从而减少了绿地支出。据预测，从2024年起，石油和天然气资本支出增长与2021-2023年相比将有所放缓。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能源出口，主要是化石燃料，占据重要地位，约占101个最依赖大宗商品国家的出口的三分之一。35个国家的能源出口占出口总额的30%以上，25个国家的能源出口占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出口额预计将受到长期负面冲击，可能会对这些经济体产生重大影响(图18)。

一些能源出口国，例如科威特、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积累了可观的化石燃料收入。这些国家有望成功实现经济多样化，一些较小的海湾国家已创造了这方面的先例。

图 18

一些国家非常易受能源出口下降的影响

2022年能源出口占商品出口30%以上的发展中国家

国家	能源出口 (十亿美元)	商品出口总额 (十亿美元)	能源出口在出口总额中占比 (百分比)
伊拉克	124.8	129.3	96.5
阿尔及利亚	57.8	60.9	94.9
安哥拉	48.1	51.3	93.7
利比亚	35.5	38.0	93.6
尼日利亚	57.9	63.6	91.1
阿塞拜疆	34.4	38.1	90.3
土库曼斯坦	11.8	13.2	88.9
赤道几内亚	6.6	7.5	88.5
南苏丹	0.7	0.9	84.5
卡塔尔	109.2	131.0	83.4
文莱达鲁萨兰国	11.4	14.2	80.3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3.6	4.7	77.2
沙特阿拉伯	319.9	426.5	75.0
圭亚那	8.3	11.3	73.3
乍得	2.4	3.5	69.4
加蓬	5.8	9.2	63.3
刚果	6.6	10.7	61.7
哈萨克斯坦	51.8	84.4	61.4
哥伦比亚	35.1	58.6	60.0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7.6	13.3	57.4
阿曼	37.3	66.5	56.1
蒙古	7.0	12.5	55.5
喀麦隆	3.2	5.9	54.8
科威特	51.7	101.3	51.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36.7	72.1	50.9
东帝汶	0.2	0.5	49.7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62.1	532.8	49.2
也门	0.4	0.9	48.2
莫桑比克	3.8	8.3	46.1
巴布亚新几内亚	5.6	14.5	38.5
厄瓜多尔	11.7	32.7	35.9
加纳	6.7	18.7	35.9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2.7	7.6	34.8
印度尼西亚	100.4	292.0	34.4
埃及	15.6	48.1	32.4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贸发会议数据库。

注：巴哈马、牙买加和圣卢西亚没有包括在内，因为它们的能源出口以再出口为主。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能源出口主要是电力出口。

为利用新的发展机遇，需要制定政策，在大宗商品的短期收益与不断增长的服务和金融部门之间取得平衡。

金融是资源诅咒的新层面

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体仍然严重依赖自然资源，债务负担、贫困现象和结构改革缓慢加剧了这一问题。虽然仍有新的发展机会，但是为了利用这些机会，全球南方需要制定政策，以便在大宗商品带来的短期收益与服务业和金融部门日益增长的作用之间取得平衡。

在这方面，金融化对依赖大宗商品的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的战略有重大影响，因为金融周期密切影响着大宗商品价格(图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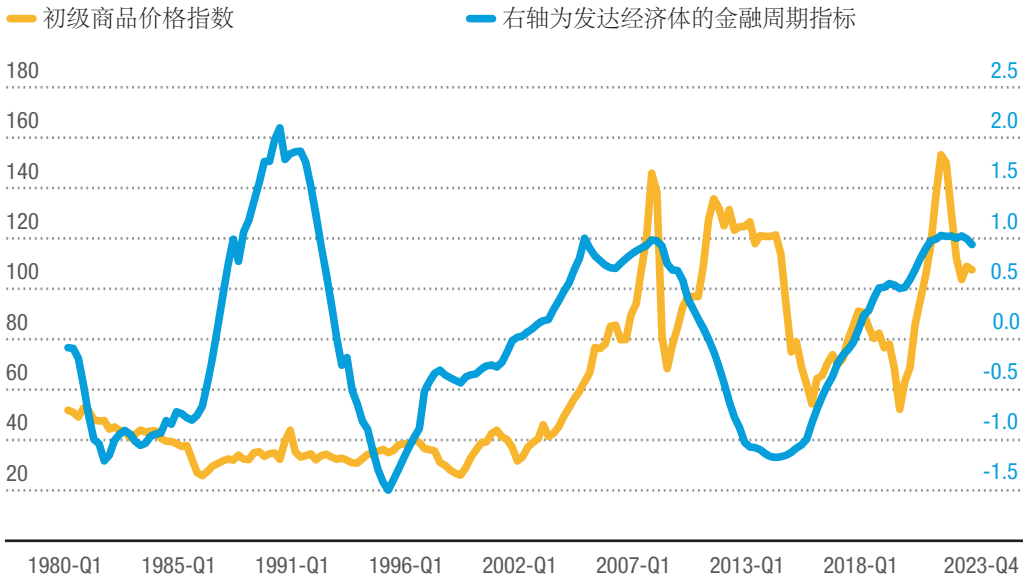
©Shutterstock_Delali Adogla-Bessa

图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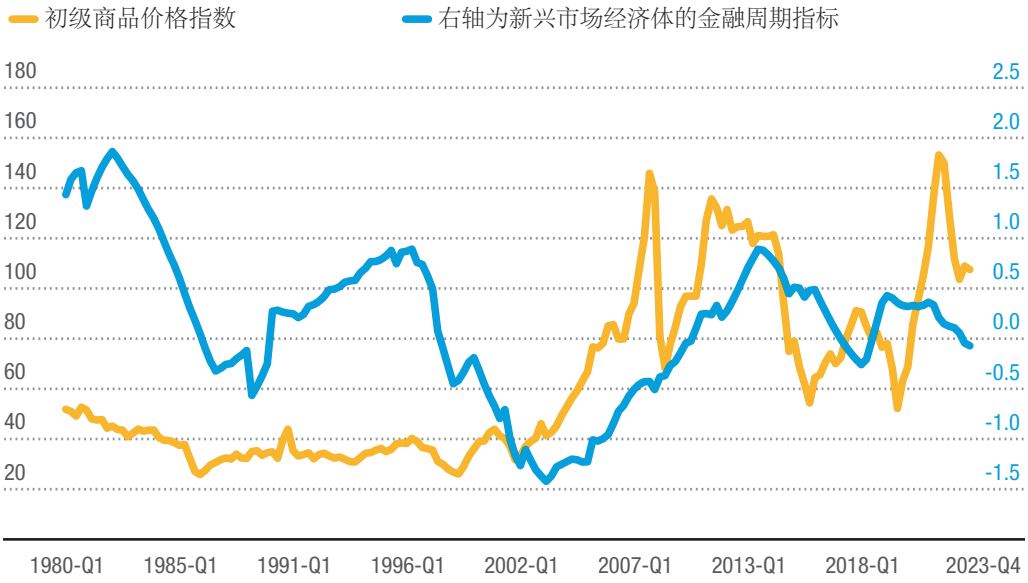
大宗商品周期即是金融周期吗？证据表明二者关系密切，对于新兴市场更是如此

金融周期指标与大宗商品价格指数(2010年=100)

A. 发达经济体



B. 新兴市场经济体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惠誉、国家数据、国际清算银行、世界银行大宗商品价格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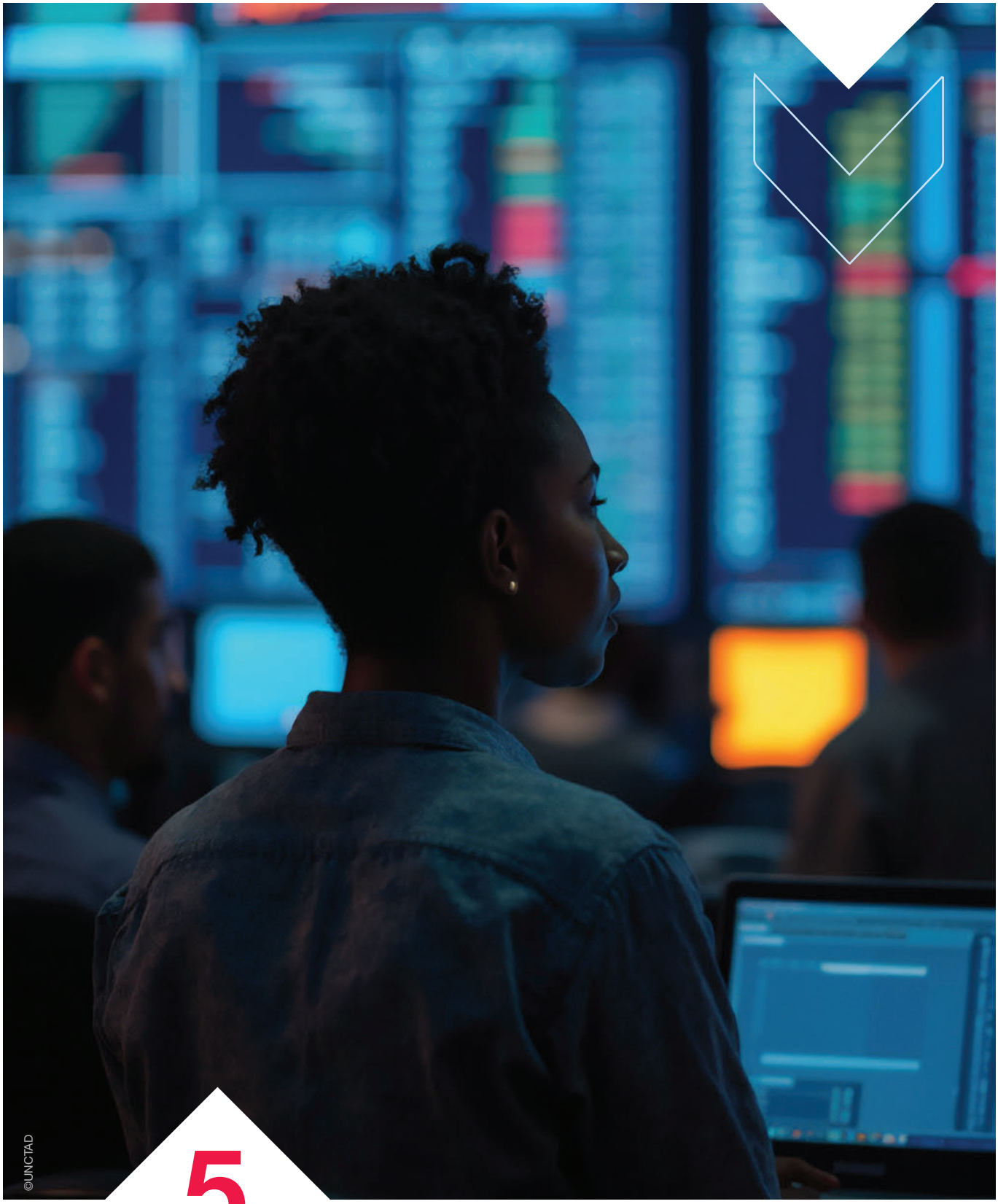
注：Q1指第一季度；Q4指第四季度。衡量金融周期时使用了基于频率的(带通)滤波法捕捉实际信贷、信贷占GDP比率和实际房价的中期周期(Borio，2014年)。在选取国家组别简单平均值之前，先通过各国平均值和标准差对金融周期进行了标准化。新兴市场经济体包括：巴西、智利、中国、中国香港、哥伦比亚、捷克、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以色列、大韩民国、墨西哥、马来西亚、新加坡、南非、泰国和土耳其。发达经济体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荷兰王国、挪威、新西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

注重长期多样化、再分配和金融监管的政策对于成功的发展战略至关重要。

避免金融诅咒

在金融化加深的背景下，能源转型正拉开帷幕，致使依赖大宗商品的挑战更趋严峻。金融部门规模过大、不受监管可能会加剧对大宗商品的依赖，限制经济多样化，并恶化收入不平等。危机时期，大宗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相互交织，加剧了经济脆弱性。当前形势下，亟需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方针，在依赖大宗商品出口实现增长的经济体保障创造就业和经济韧性。具体包括：

- 注重长期多样化、再分配以及全面的金融监管框架的新政策。
- 平衡采掘部门的增长和金融化，促进国内收入调动，遏制企业套利并加强对跨国企业的监督，以培育经济韧性并在全球南方实现公平。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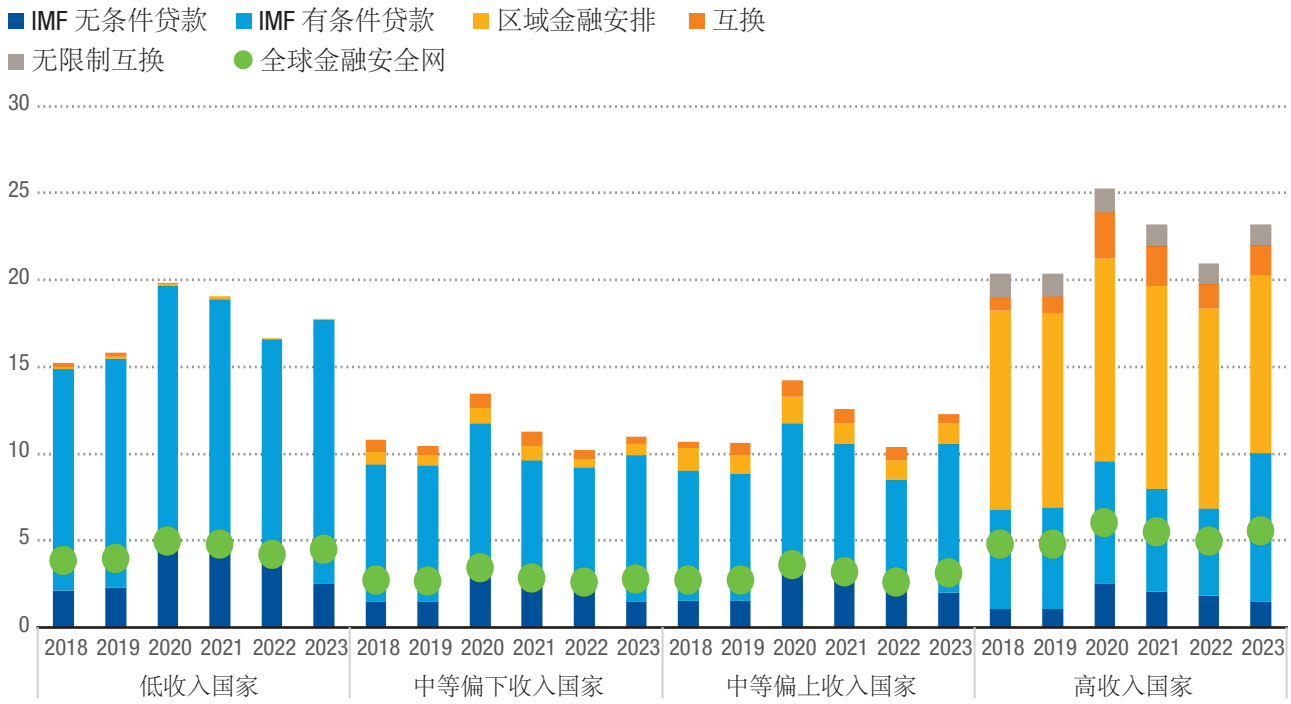
全球南方及其对长期发展资金的寻求

债务危机可能演变为发展危机，国际金融改革日益紧迫。

由于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卫生和社会服务需求增加，保护主义抬头和地缘经济变化给国际贸易带来限制，发展中国家深陷复杂且相互重叠的危机，面临着艰难的政策取舍。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仅22个国家被评为投资级，说明筹集资本仍是一项艰巨挑战。成本高昂，外部私人融资不稳定，获得负担得起的公共融资的机会有限，加剧了本已巨大的发展资金缺口。

随着发达国家的财政和贸易政策转向支持国内的长期再工业化和绿色转型，最大限度提高私营部门的回报和资产估值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关注焦点。在此背景下，全球金融架构自80年前设立以来未曾变化。偿债压力有可能演变为全球南方的发展危机，因此改革全球金融架构更显紧迫。全球金融安全网当前的要素不足以满足许多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图20)。

图 20
在全球金融安全网中获得危机融资的机会不平等
各国家收入组别获得贷款的情况
(占国内总产值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基于全球金融安全网追踪系统和Muhlich et al. (2024)的数据。
注：IMF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绿色圆点表示所有单项的平均值。另见全球金融安全网追踪系统数据库方法学指南，可查阅 https://www.bu.edu/gdp/global-financial-safety-net-tracker/ 。

及时灵活的流动性、债务减免、主权债务重组和扩大发展贷款范围仍是发展筹资的最高多边优先事项。这些提案在贸发会议关于构建具有发展意识的国际金融架构的改革议程中处于核心位置(见表1)。

表 1
关于改革国际金融构架的提案

贸发会议的提案	联合国《我们的共同议程》政策简报6建议的相关行动
机构改革	**行动 1.** 转变国际金融机构治理
	行动 2. 设立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最高机构，以系统地加强国际体系的一致性
▸**流动性**	**行动 10.** 加大流动性供给，拓宽金融安全网
1965: 与援助挂钩的特别提款权普遍分配 **1971**: 成立二十四国集团	**行动 11.** 应对资本市场波动
▸**投资**	**行动 5.** 大规模增加发展贷款，改善贷款条款
1964: 多边利息平准基金(霍洛维茨提案) **1965**: 与援助挂钩的特别提款权普遍分配 **1970**: 官方发展援助目标设定为国民总收入的0.7% **1971**: 确立最不发达国家的定义 **2014**: 支持由南方主导的多边开发银行	**行动 6.** 改变多边开发银行和其他公共开发银行的业务模式，注重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更加有效地利用私人融资，增进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
	行动 7. 大幅增加气候融资，同时确保额外性
	行动 8. 更加有效地利用开发银行系统，增加贷款并提高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
	行动 9. 确保最贫穷者能继续享受多边开发银行系统带来的好处
▸**债务**	**行动 3.** 减少债务风险，加强主权债务市场，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
1980: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商定，需要建立公正主权债务解决机制 **1983**: 创建债务管理和金融分析系统 **2012**:《负责任的主权借贷原则》 **2014–2015**: 联合国大会决议设立主权债务重组进程问题特设委员会，界定基本原则	**行动 4:** 分两步加强债务危机解决办法：设立债务解决机制，以支持《共同框架》，并在中期内设立主权债务管理机构
▸**金融与企业的关系**	**行动 12.** 加强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和监督，更好地管理风险，控制过度杠杆
1967: 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议设立国际税务合作特设专家组 **1975– 1993**: 成立跨国公司中心	**行动 13.** 提高企业的可持续性，减少洗绿现象
	行动 14. 加强全球金融诚信标准
	行动 15. 加强全球税务规范，通过切合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利 益攸关方的需求和能力的方式，凭借包容性进程，应对数字化和全球化
	行动 16. 改进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指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包容性框架中所列提议的支柱二，减少浪费性税收激励，同时更好地为来源国征税提供激励
	行动 17. 创建惠及所有国家的全球税务透明度和信息共享框架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联合国(2023)，其中列有更详细的次级行动。
注：黄色部分表示应对气候与环境可持续跨领域挑战的行动和/或次级行动。

长期发展筹资需要有效的收入调动机制作为基础。

不止改革任务紧迫，长期发展筹资还需要有效和协调的国内收入调动机制作为基础。这对于发展国家能力和维持宏观经济稳定至关重要，同时让政府能够不依赖外部来源进行所需投资。

一项重要的内容在于拟订发展中国家从跨境活动中获取税收的范围。目前，发展中经济体一般缺少相关资源，难以有效应对税基侵蚀和跨国企业的利润转移活动。2015年至2019年，跨国公司利润的近40%转移到避税天堂，导致全球企业税收减少10%。与富裕国家相比，受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损失的收入占总税收的比例更大。

国内收入也受到公司套利和非法资金流动的影响。贸发会议的研究表明，世界百强非金融跨国企业在全球南方的子公司中，约四分之一没有从事明显相关的经济活动。与进出口伪报相关联的非法资金流动进一步损害了收入调动，这一问题尤其出现在采掘业。例如，在布基纳法索和南非有研究表明，黄金、石油和机电领域存在大量非法流动。有些情况下，非法流动可能占到官方记录贸易额的半数之多，给这些国家的税收造成沉重打击。

一项新的国际税收公约可以弥补全球金融中的漏洞并促进国内收入调动。

2023-2024年，联合国会员国成立了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框架公约特设委员会。这一举措应能让发展中国家有机会引导方向，制定一项能够弥补国际金融架构的漏洞并加强国内收入调动机制的公约。

拟议的公约着眼于建立一个国际税务合作的全球多边框架，以应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避税和非法资金流动等问题。当前税收制度严重依赖双边协定和有限的多边合作，这项公约则可以为全球税收治理建立一个全面的平台。

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框架公约能否成功取决于几个因素：

- 发展中国家之间有效的政策合作以及南北对话。
- 包容性和透明度，联合国将之作为优先事项，这一点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举措形成对比。此外，联合国更加顾及全球南方的需要。
- 能够塑造国际税务合作的未来并改革全球金融架构的国际税收改革。
- 应对套利和不平等问题以及税制差别的风险，这些因素可能影响全球贸易和投资流动并限制国内收入调动。

一个可以为所有人带来希望的转向

当前，世界贸易、金融、技术和地缘政治正处于关键节点，给全球南方经济体带来了重大发展困境。在气候危机和全球低增长的背景下，全球化转向正在显现，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机会。新的贸易和产业政策正在重塑国际贸易，但全球金融架构自80年前设立以来基本没有变化。由于这两个体系之间的错位，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空间正在缩小，债务负担正在加重。

绿色转型技术以及蓬勃发展的南南贸易和一体化也正催生新的机遇。然而，为了充分利用这些机遇，需要在经济结构转型、产业政策和金融治理方面采取新方针。在国家层面，各国需要具备切实的机构能力。在多边层面，南北对话和政策协调需要引导全球经济走向植根于集体利益以及包容和稳定的方向。2024年在多边领域迎来了重要开端，这样的努力需要尽快扩大，以便为所有人实现可持续的未来。

全球南方面临发展挑战，需要新的贸易和产业政策以及金融治理以实现可持续性。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是联合国处理贸易和发展问题的主要机构。

贸发会议通过就贸易和发展问题开展研究和分析，提供技术援助，促进政府间建立共识，努力确保发展中国家更公平地从全球化的经济中受益。

贸发会议现有195个成员国，是联合国系统中成员国最多的机构之一。

2024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2024 UNCTAD. Image created using AI.

Printed at United Nations, Geneva – 2418977 **(C)** – May 2025 – 120 – **UNCTAD/TDR/2024 (Overview)**